

范文瀾著

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

爲出
清不得

新華書店發行

漢奸創子會國藩的一

范文淵著

新華書店發行

漢奸創子會國藩
的 一 生

著者 范 文 瀾
出版者 新 華 書 局
發行者 新 華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六七九號
上海河南路一七〇號
新華印刷廠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0084

1949年7月 1—10,000(滬)

出版者的話

要求民主的中國人民，和反對民主的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中間有種種鬥爭，對於中國歷史的不同的了解是這種鬥爭之一，而在這一方面，關於曾國藩的爭論可以說是——一個特別尖銳的標本。孫中山先生是擁護洪秀全、反對曾國藩的，他自稱爲洪秀全第二，痛罵曾國藩輩的『以漢攻漢』的漢奸行動爲『廉恥道喪，莫此爲甚』；而現在中國的一切反動統治人物却以祖先崇拜的虔誠來供奉曾國藩，把曾國藩的著作大量翻印來作爲他們訓練幹部麻醉青年的教材，對於太平天國的宣傳則加以限制和禁止，譬如關於李秀成的戲劇即被禁演，並因此在四川綦江釀成過可驚的屠殺青年的血案。他們這種對於孫中山先生的公然的反叛，當然是他們整個地背叛革命三民主義的邏輯結果。太平天國是中國人民百年來轟轟烈烈的民族民主鬥爭的偉大旗幟，而曾國藩則是百年來中國一切賣國賊反動派的祖師，這兩條路線的鬥爭至今還沒有完結，或者正因爲它快要完結了，所以曾國藩的餘孽便不得不更加努力地抬出幽靈的木主來作絕望的掙扎。這種情況，不能不使我們對於曾國藩的假面具加以揭穿，而范文瀾同志的這篇文章，就根據真實證據

給我們解決了這個問題。因為會國藩的衣鉢，過去既有它的傳統淵源，今天又有它的脈夫走卒，讀者讀了這篇文章也就不但可以澈底弄清楚近代中國史的一場重大公案，而且可以得到理解古代和現代中國政治的一柄「鑰匙」。

一九四四年九月

目 錄

- 一 辦團練 (一八五二年——一八五四年) 五
- 二 與太平軍相持 (一八五四年——一八六一年) 九
- 三 戰勝太平軍 (一八六一年——一八六四年) 二〇
- 四 保守既得成果同時反動派內部的各種
分裂表面化 (一八六四年——一八七二年) 二五

滿清中央政權——軍機大臣、六部尚書，名義上最高權力，實際上主要權力均在滿員之手。地方政權——各省督撫滿員常佔十之六七，對軍政大權。例如鴉片戰爭時，首席軍機大臣是穆彰阿，沿海各省，皇朝國書云山東巡撫託渾布，兩江總督伊里布，浙江巡撫烏爾恭額，閩浙總督（駐蘭州）鄧廷楨、陳奕禧、撫怡良，欽差大臣兼兩廣總督林則徐，就中除林鄧二人，全是滿員。鄧廷楨、陳奕禧、奕經，議和大員耆善、伊里布、耆英，又全是滿員。這些滿員都是曾貴貧薄，對中國人民沒有絲毫愛護的心理，而林則徐、鄧廷楨這樣的漢員，又為滿員所壓迫嫉視，不但沒有決定的權力，而且還要加以誤國病民的罪名，充軍到新疆去。

但是，這種情形，到曾國藩時代起了一個變化。曾國藩是滿清符與大權的第一個漢人，因為他以血腥的手腕暫時撲滅了漢族人民的反抗，暫時拯救了滿清統治者的大危機。

太平軍起義，人民響應，聲勢蓬勃，以咸豐帝為首的滿族統治集團驚惶失措，束手無策。咸豐帝首先向程朱道學求救，令儒臣獻上朱熹大學講義，又編呈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四篇講義。他親自到孔廟行禮，召集滿漢百官聽他講中庸致中和一

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尙書四句（『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從這些講題看來，他也知道政治太不『中和』太無『德』『惠』了。但空談是無補的，他轉向奴才們求助，大罵羣臣道：『試問諸臣午夜捫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將來有不堪設想者矣！』又說『爾等甘爲大清國不忠之臣，不亦愚乎？』但腐朽入骨的百官，不管怎樣痛罵，還是無濟的。他再向士子們討好，斬舞弊主考柏後（滿族大學士），表示公平取士，但科場積弊極深，並不能『爲士林維持風氣』。他灰心失望，索性懶管政務，專玩女色，寵妾那拉氏（西太后）替他批閱奏章，嬖臣肅順替他找美女，同時也出些政治上主意。一八六一年秋天，他在熱河發癆病死了。

曾國藩就在這個時候，由於肅順和那拉氏的提拔，出任滿清統治者壓迫屠殺人民的急先鋒。那拉氏、肅順二人是當時滿洲皇族裏最有『政治頭腦』的，他們知道了挽救滿清的統治不能依靠漢人而要依靠漢奸。肅順公開宣稱『滿族沒有一個人中用，國家有大事，非重用漢人不可』。一八五四年（咸豐四年）曾國藩率湘軍攻陷太平天國的武昌，咸豐帝得報大喜，對軍機大臣們說：『不圖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殊勳。』漢軍機那舊藻獻媚道：『曾國藩一在籍侍郎，猶匹夫也，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者萬人，恐非國家之福。』咸豐帝被他提醒，臉色變了，半天轉不過氣來。從此他堅守慣例，不敢信任曾國藩，專指望向榮（江南大營）、琦善、托明阿、德興阿（江北大營）、和春（兼統江南北兩大營）這些滿族將領的勝利，雖然他們的所謂大營也還是專靠張國樑一

人支持。曾國藩這時候還得掌握一部份兵權，這就全靠肅順的竭力保薦。一八六〇年，即咸豐帝死的前一年，和春、張國樑被李秀成擊潰，滿軍軍勢大衰，只得任曾國藩爲兩江總督，以挽危局。咸豐帝死後，那拉氏親自執政，她馬上改變政策，給曾國藩兩江總督節制蘇皖贛浙四省的重要地位，讓他充分發揮漢奸作用。

曾國藩從此不但與滿清皇帝更親密地結合在一起，而且與外國侵略者也結合在一起，厲行所謂『安內攘外』，終於將太平天國的革命火焰淹沒在幾千萬人民的血泊之中。曾國藩的這個『事業』，使他成爲百年來一切出賣民族的漢奸與屠殺人民的劊子手的開山祖。

曾國藩是湖南湘鄉縣一個富農家的子弟，這一家人都有殺人的癖性。他和曾國荃、曾國華帶兵殺人。他的父親和四弟在家鄉依勢橫行，無惡不作，誰要是不合他們的意思，就被加上會黨的罪名，送到縣裏，教縣官立即執行死刑，不許釋放或監禁。縣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對自己不利，隔幾天總要私哭一次。有人問他，他說『曾四爺又欲假我手殺人矣』。縣裏設立碼頭，照例殺豬祭神，曾家父子以爲不夠虔誠，殺十六個人代豬，表示敬意。曾國藩在這一家人裏尤爲特出，因爲他不僅兇惡超人，而且還善於講道德仁義來掩蔽超人的兇惡。他在道光十八年應科舉成翰林，道光末年已升官到侍郎。他從滿人倭仁、湖南人唐鑑講習程朱道學，又被與乾隆時和坤並稱滿清二大奸相的另一道學老師程彰阿認作特等人才，向道光帝密保，因此升官特別快。曾國藩既然一開始就是程彰

阿的門生私黨，又是號稱理學大師倭仁（官至首席大學士，爲西太后所尊重）的講學後輩，故與滿洲貴族有親密的關係；他的前輩唐鑑在湖南聲望也很高，學徒衆多；再加他本身侍郎資格；這些對他後來的『飛黃騰達』，都是有力的條件。曾國藩學得道學的虛僞，却不會受束縛於道學的迂腐。邵懿辰（今文經學家）當面責備他虛僞，說他對人能作幾副面孔。曾國藩說『我生平以誠自信』，專標一個誠字來用人、辦事；左宗棠與他因派別衝突，結成深仇，就專標一個僞字來揭穿他。事實上虛僞和殘忍是結合在一起的，虛僞乃是殘忍的一方面，這兩方面正是曾國藩這個反動派代表者的特點。沒有虛僞就不能表現他反對革命的眞誠。

當時的滿清統治，內政則殘暴貪污，外交則喪權賣國，這是無論何人不能代爲隱諱的。連曾國藩這樣一個『誠實』走狗也不能不承認滿清『錢糧太重，民不聊生；官吏害民，甚於盜賊；冤獄太多，民氣難伸；』（咸豐元年『備陳民間疾苦疏』）『外面完全，中已潰爛。』（道光三十年『應詔陳言疏』）這樣惡貫滿盈的政府，人民還不該革命自救麼？曾國藩却堅決屠殺數千萬革命人民（依容閔估計，約二千五百萬人死在戰爭中），來保持這個萬惡的滿清政府，除了他的階級貪暴性和漢奸卑劣性，任何理由也不能說明他和他所領導的一大羣賊匪爲甚麼必須這樣做的原因。

曾國藩深研程朱道學，熟悉清朝政制，當京官時已顯出他的一副手腕不同於一般官僚。帶兵以後，雖不斷受了革命方面的打擊，但反革命意志却極堅決，自稱能在受挫受

辱的時候，咬牙立志，毫不氣餒；愈是軍事棘手，衆議指摘，自己更加「心明力定」，「從耐煩二字痛下工夫」。後來一切反動統治階級崇奉這個「曾文正公」作模範、作祖師，認他「是我國舊文化（封建文化的反動黑暗面）的代表人物，甚至於理想人物」，把他的漢奸反革命方法及其投降妥協的外交路線，當作統治人民與麻醉青年的經典，完全是合理的。可惜他們不懂得曾國藩那一套反革命本領，只能暫時摧殘太平天國一類的初期幼稚的革命，拿到今天來破滅久經鍛煉的中國人民的抗戰民主事業，就決無成功的可能了。

曾國藩的活動與滿清這一時期的歷史關係不勝枚舉，從一八五二年（咸豐二年）至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可分爲下列四個階段：（一）辦團練；（二）與太平軍相持；（三）戰勝太平軍；（四）保潔既得成果同時反動派內部各種分裂表面化。

一 辦團練

（一八五二年）

太平軍在廣西永安時不超過一萬人（上帝會員，老兄弟）。入湖南後，因湖南天地會員的加入，人數大增，首領衡山人洪大全，曾與洪秀全同稱萬歲。但自洪大全在永安

城外被捕死後，天地會地位降低，不得享老兄弟待遇，一部份人遂逃回原籍，響應本地會黨起事。他們股小而多，力量微弱，這就給當地官紳辦團練來對付他們的機會。

團練一方面保護地主官紳的財產，一方面也使他們藉以魚肉鄉民，斂財自肥。它是地方性的暫時武裝，沒有出縣作戰的意圖，更說不到出省作戰。從保甲團練以至編成正式軍隊，轉戰全國，這是由於當時滿洲反革命軍隊的腐敗無能，而一切反革命派——從滿清皇帝到各種大小漢奸——却都要求有一個反革命勁旅來和太平天國作戰所促成的。曾國藩所以能夠進行這樣大規模的反革命活動，就正因為湖南當時是處在革命與反革命的衝突的要衝；同時他與滿人關係親密，善講滿清統治者所需要的程朱道學，有堅決反革命的決心和手腕，這幾個條件也幫助了他。咸豐二年，曾國藩喪母在家，咸豐帝叫他幫助湖南巡撫辦理本省團練，任務只是『搜查土匪』。次年正月，他到長沙辦事，首先區別了團與練。他所說的團就是保甲，選擇所謂『公正紳士』（事實上是最兇惡的紳士）當團紳，在本地清查戶口，捕捉『匪人』（主要是當時的革命分子）；他所說的練則是訓練鄉兵，集中縣城，隨時出動鎮壓反抗。他表面上着重在辦團，不重在辦練。凡是紳士族長來請辦團，就發給鄉團執照、族團執照，使有約束鄉、族，放手辦事的權力。辦練必需地方官主持，兵數不求多（約四五十人），更不求各縣都練。實際上却是授權反革命紳士普遍辦團，自己在省城募勇辦練，不讓地方官紳辦練斂錢，既免分他的兵權，又免引起人民新的反抗。他說他辦的是官勇不是團丁，足見他開始就有以官勇（臨

時招募)代官兵(綠營兵)出省作戰的野心，不過形式上採取所謂保鄉自衛，藉以減輕、避免各方面的阻礙(如本省文武官的仇視、排斥，鄰省的求援，咸豐帝的嚴令出戰，新兵的不願離鄉土)，且藉以實現他的訓練不完成、準備不充分、決不出省境的主張。

曾國藩辦團的方針是大張紳權，在省城設『發審局』，凡團紳送被捕人到局，立即殺死，禁止屍親呼冤，又禁止向團紳講理。他竭力提倡團紳捕人，地方官殺人，捕人要多，殺人要快，官殺人『不必拘守常例』，紳捕人『不必一一報官』。他那種瘋狂的屠殺，連巡撫司道等大官也看得太無人理，與他爲難(主要是反對他越職侵權)；人民更陷入朝不保夕的險境，大家叫他『曾剃頭』，形容他殺人像剃頭髮那樣多。他感覺到公論不容，給咸豐帝上了一個奏章，說『臣身雖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嚴辦土匪以靖地方摺』)。自然，咸豐帝大加褒獎，鼓勵他『務期根株淨盡』，巡撫們也就不敢公然對立了。這樣，曾國藩成爲湖南土豪劣紳的首領，同時也得排除某些阻礙，進一步完成他的辦練計劃。

曾國藩辦練的方針是封建團結。練勇與將領全用湘鄉人(湘軍、湘勇由此得名)。練勇招募落後的農民充當以便制馭。將領選取至親、密友，以及秀才、童生，這些人多是羅澤南(與曾國藩同學，也講程朱道學)的學徒，平時講究所謂『忠誠』，聲稱願爲保衛『聖道』『倫常』而死戰。事實上他們主要目的還是爲了求富貴。曾國藩也不願意羅

澤南勢力獨盛，採用收門生的方式，使羅氏學徒爭着拜曾氏做老師。湘軍大將王珍（即王鑫）不服，說『我的老師只有羅山（澤南）一人』，大遭他的嫉忌，終被排去，其舊部後來即形成左宗棠系的湘軍。曾國藩用同鄉、同學、親友、師生四種關係團結湘軍，造成私人軍隊誰招募服從誰的作風，同時又奉他爲唯一的獨裁領袖。在左系湘軍成立以前，整個湘軍只服從曾國藩一人，每個營只服從營官一人。各個營獨立，彼此不相統屬，除服從曾國藩，不受其他任何人節制。近代軍閥軍隊從曾國藩湘軍開始，李鴻章淮軍、袁世凱北洋軍等等軍閥軍隊一直繼承到現在。

太平軍佔領土地在長江沿岸，非水師不能決勝負。因此曾國藩用更多的力量籌辦長江水師，大造船艦，尤其重視洋炮，要求咸豐帝向廣州購買千餘尊，裝備戰船，洋炮不到，決不出戰。他崇拜洋炮，贊美備至，認爲戰勝的決定因素。

咸豐四年二月，湘軍水陸兩軍組織完成，大舉出戰。陸軍五百人爲一大營，非湘鄉人營官所統鄉勇稱小營，附屬於湘軍各大營。陸軍凡十三營，五千餘人。水師戰船二百四十，坐船二百三十，凡十營，五千人。官員、練勇、工匠、夫役水陸共一萬七千人。湘軍將士在思想上有以程朱道學作基本的封建主義的武裝，在軍事上有相當周密的準備，在湖南後方有豪紳地主的擁護，算是當時有力的反革命軍隊。

湘軍出境，曾國藩請求咸豐帝發給他空白執照四千張，內捐虛銜執照、捐監生執照各一半，派專人在湖南（湘軍根據地）、江西（湘軍進攻的目標）、四川（湘軍餉源之

一)等省募捐。大規模開捐，籌餉是目的之一，主要還在讓那些缺乏社會地位的反動分子取得紳士資格，在本地辦團。他的主意是「以紳輔官，以民殺賊，佐兵力之不足」。
(『奏參江西巡撫陳啓邁摺』)

曾國藩反革命事業的主要依靠之一，是在善於爭取滿洲皇族的信任。他辦團設「發審局」，殺人如麻，負責局員二人，其一是滿人裕麟。他練鄉勇，遭綠營將領(多是滿人)猛烈反抗(甚至採用兵變方式)，乃用色欽額總管營務，保舉塔齊布升任湘軍大將，二人都是滿人又都是綠營出身的軍官，使綠營反抗不成大害。後來出境作戰，總是上奏章，誇張塔齊布的忠勇和戰功，說他們「二人親如兄弟，合如膠漆」。塔齊布死後，特別尊崇多隆阿，曾一度推他做統帥，指揮湘軍大將攻安徽陳玉成軍。曾國藩力求取得滿族統治的信任，以便放手屠殺漢族人民，就在小事細節上，也避免引起猜忌。

二 與太平軍相持

(一八五四年——一八六一年)

咸豐四年二月，曾國藩率水陸軍準備出戰，首先頒佈一道叫做「討粵匪檄」的文字。這篇檄文充分表現湘軍將領的封建性、漢奸性。大意如下：

(一)『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江西、安徽、江蘇）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針對太平軍老兄弟新兄弟的區分，挑撥內部分裂。

(二)『粵匪崇天主之教，謂田皆天主之田也，貨皆天主之貨也。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觀，不思一爲之所也。』針對太平軍之崇奉耶穌與宣傳原始共產主義，着重號召讀書人反對天主教，保衛孔孟聖道。這一號召不僅對當時的讀書人有很大的作用，而且也迎合了一部份當時還散佈在民間的守舊觀念。

(三)『粵匪焚郴州之學宮（孔廟），毀宣聖（孔子）之木主。所過州縣，先毀廟宇，關帝岳王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此又鬼神之所共憤。』針對士人尊孔思想，人民迷信心理，挑起宗教仇恨。

太平軍宣佈的民族大義，曾國藩却一字不敢提到，只說幾句『今天子憂勤惕厲，敬天卹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連他自己也不相信的鬼話。在宣傳上，太平軍在反滿清、反官僚、皮地方方面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湘軍在反對天主，保護孔、孟方面也有若干影響。在軍事上，太平軍紀律嚴明，絕不騷擾，到處受人民歡迎；湘軍攻城奪池，盡量燒殺搶掠，將士得名得利，因此作戰也非常兇悍。在政治上，太平軍領土內一般人民安居樂業，生活比較改善；湘軍實際是曾國藩率領若干股賊匪，出省恣意殺掠，但他

代表全國所有反動黑暗勢力，又以投降主義的方法緩和統治階級的內部的滿漢矛盾，以及中國統治階級與外國侵略者的矛盾，求得某種程度的反革命團結，基礎也還不弱。太平軍和湘軍在這些條件下進行十二年戰鬥，相持階段佔了八年。最後太平軍失敗了，這却不是因為湘軍有甚麼特別的本領，而是因為太平軍一部份領袖的短見——他們一到南京就不圖進取，日趨驕慢，以至中途腐化分裂——的結果。

太平軍到達南京，即採取保守主義。不乘勝以主力北上，發動北方民衆，直搗反革命的 basic 集穴——北京（在當時是完全可能的），讓敵人得以從容重新調度力量，這是戰略上最大的失策，成爲後來失敗的張本。不僅如此，太平軍在下游不取上海、江浙，滿清仍得享受漕米（北京滿人及官員的生命）、地丁、關稅、鴉片捐、外交權等利益，上游不發動、領導捻軍及其他起義軍，空耗兵力與滿清爭武漢三鎮，旋得旋失，終不能守，在這些方面，戰略上也已處失敗地位。湘軍作戰計劃，先取武漢，扼上游形勢，推胡林翼（也講程朱道學，與左宗棠同學）坐鎮調度，他的反動才能至少同曾國藩一樣，有時還要高些，湘軍後方鞏固了。第二步入江西攻取九江，第三步進安徽取安慶，最後取南京。曾國藩固守這個方針，即是在危急關頭，也死不放鬆（如在江西星子縣與安徽祁門縣誓死不移營）。太平軍石達開攻江西，陳玉成攻安徽，李秀成攻江浙，總不能牽動他的主力（曾國荃部爲基幹）變換方向；甚至英法聯軍進攻北京，也不會動搖他的這個反革命戰略步驟。